

傅蘭雅與中國近代譯學

吳相湘

英人傅蘭雅在我江南機器製造局，譯述西洋科學技術書籍二十八年，是中國近代譯學史上重要階段：上繼二百餘年前利瑪竇評介西學餘緒，發揚光大；提示「譯西書第一要事爲名目」，並編製中西名目對照表，力求譯名一致標準化；爲近百年來譯學界建立偉大指標。加以他注意使西洋科學技術普及於中國一般社會，對我國人維新思想具有啓發作用。一八九六年起擔任美國加州大學東方語文講座教授十七年，美國西岸研究中國文化基礎從此奠定。溝通中西文化，一身任之近五十年。這樣經歷極少人可以相提並論。

傅蘭雅英文原名 John Fryer，一八三九年八月六日，生於英國亥司（Hythe Kent）一清苦牧師家庭。半工半讀完成中等教育後，獲政府第一等獎學金，進入倫敦一所專門訓練教師的 Highbury Training College。一八六〇年畢業時有兩項工作由他選擇：一在美國本土，另一即香港聖保羅書院院長職位。由於他的父母長久以來深受自東亞回國的教士與商人影響，對中國具有濃厚興趣，他母親且時常煮米飯佐食表現這種興趣。傅蘭雅在這樣環境中長大，今有東行工作機會，自然樂於接受。一八六一年八月，他滿懷興奮到達香港就任新職。

聖保羅書院着重培養中國青年擔任傳教牧師。傅蘭雅主持校務兼授英文，並且學習中國文字和說廣東話。一八六三年，傅蘭雅北上擔任新成立的同文館英國語文教師。其實到北京去學習中國官話却是他此行的基本目的。

傅蘭雅在北京和中外高官大吏如總理衙門大臣文祥及英美駐華公使參贊等都有來往，加深他對中國的認識和了解。傳統的中國教育制度與方法很使他驚訝：學童祇知遵循老師聲音背誦，却不了解字義；絕少

人願學習外國語文，國文館二十餘名學生祇是由於每月可領幾兩銀子而來。這使得傅蘭雅教授興趣大大減低。一八六五年夏他南下上海，就任中西書院院長。

中西書院創立初意在教授中國人學習英國語文及基督教義。傅蘭雅就職後發現學生都是通商口岸中國商人、錢莊、買辦的兒子，熱心學習英國語文。因此他決定等到學生具有英文基礎後再閱讀聖經，以免學生因宗教氣氛濃厚而不願來學。一八六六年五月，傅蘭雅又決定：學生每日上午三小時英文課程，下午上三小時中文課程，他並且隨學生在中文課堂學習。這不祇是以「身教」學生習讀中文的重要，他自己對中國語文的程度也與日俱增。同時對於教習英文也越來越厭倦。

傅蘭雅發現學生們都用全力學習英國語文，却不注意中國語文課程，尤其很多學生在學習初級英語後即離開學校回到自己父兄商業去工作。很少人對宗教有興趣。因此，一八六八年五月二十日，中西書院宣告關閉。

中西書院開辦不過十年，學生大約二百餘人，為各通商口岸商行培植了若干對外貿易的人。其曾受中

傅蘭雅教授的鄭觀應最爲突出，他在經商營利餘暇仍留心國事世局以及中西強弱所在。經他多次增訂發佈的國是意見「盛世危言」，更發生若干作用。孫中山先生在創立興中會以前曾和這位具有革新思想的香山同鄉多有往還，兩人在思想上且互有影響。

早在一八六六年十一月，傅蘭雅即利用課餘主編「中文教會新報」刊載中外新聞及評論。他按時譯述西洋報刊論述，並撰寫社論發表對中國朝野建議。例如一八六七年北京同文館增設天文算術班時，他撰論建議應進一步選拔二十歲以下學習歐洲語文三年的聰敏青年前往歐洲大學肄業。他並提示日本已認識世界各國競爭激烈，展開明治維新，中國亟應急起直追。事實上：他已注意到中國人對學習西洋科學等等的願望，企盼閱讀中文書刊多傳佈這些西方知識。因此，當中西書院關閉時，即一八六八年五月，傅蘭雅決定應聘到江南機器製造局翻譯館工作，從此獻身這一事業二十八年。

華蘅芳徐壽建議創設翻譯館

江南機器製造局於一八六五年開工，是清季自強運動的產物。規模宏大，住居全球大兵工廠前列，在東亞更是無雙巨霸。初以製造西式兵艦槍炮爲主要工作，後逐漸擴增。創立翻譯館，廣方言館也奉命撥歸管理，都是介紹西洋科學技術的重要舉措。

翻譯館的創設是製造局幫辦徐壽（1818-1884）、華蘅芳（1833-1902）建議。他們弱冠時對明末天主教士譯述天算各書即已有心得，後旅居上海與美國耶魯第一位中國畢業生容闈（1838-1911）及著名算學家李善蘭（1811-1882）等交往，並獲得基督教會主辦「墨海書館」刊行李善蘭與傳教士新譯諸書，更加驚羨，用功益勤。事實上：當時上距利瑪竇等東來譯介西學已有二百餘年，西洋科學技術年有進展，英國產業革命後更是日新月異。不幸中國自一七一五年嚴禁天主教傳佈，西學東傳橋樑中斷已一百五十餘年，完全不知西洋科學進展近況。徐、華諸人幸有天賦及機緣才發現「新大陸」。一八六一年，徐、華入曾國藩軍幕，奉命參考西書繪圖與工自製輪船。四年以後，在完全自力摸索歷經困難下造成一二二十五噸小輪試航長江成功。因此，是年江南機器製造局開工，本

國人極具信心與希望。華、徐參與製造局工作之餘，每一回憶自己苦學的困難，殊不願國人再浪費不必要的時間精力，因建議製造局總辦轉報曾國藩：「將西國要書譯出，不獨自增識見，並可刊印播傳，以便國人盡知」。且即寄信英國購買「泰西大類編書」（按即大英百科全書）擬擇要翻譯，俟書成後可在各省設院講習，使國人了解新知。

一八六八年十一月，清廷正式批准江南製造局增設翻譯館，但實際工作早在半年前即已開始，傅蘭雅也已到職與華、徐詳細研討工作計劃及細則。後來又加聘瑪高溫（John MacGowan）、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金楷理（Reverend Carl Kreyer）等參加。他們都是華、徐舊識，祇是另有專業，不能全日工作，後來也沒有長久供職。祇有傅蘭雅獻身於此二十八年。

中國人參加譯述的有華衛芳、徐壽及其子徐建寅。著名算學家李善蘭也曾一度到館工作，後應聘北京同文館算學總教習才離滬北上。另一精研算學的賈步緯以及通醫術的趙靜涵、曉時事洋務的蔡寵九、鄭熙臺等也受聘任職。一位留美十年的醫學博士舒高地在

翻譯館是一主角，同時在廣方言館教授英文。這是他於中英語文都能運用又具醫學專長，譯述醫書尤多便利。

譯西書門類、方法與敬業精神

翻譯館創立後，傅蘭雅、華衛芳、徐壽等幾經商討，決定了兩大問題：（一）為何選擇西書譯述？（二）譯述時主要守則。

最初，華、徐原計譯述英國百科全書；但傅蘭雅認為是書若干卷內容太簡略，且近代所有新理新法多未列入，故必須選擇更大更新書籍才可翻譯。乃放棄初計，而以選譯單冊格致（科學）新書為優先。平常選書法，是傅蘭雅等與華、徐等選擇適合自身所急用的，不論其書與他書是否配合；至於水陸兵勇武備有關各書，經上峯指示多較他書先行譯述。

傅蘭雅當時向英美各書店訂購書單今仍有若干存世，試一比較其譯印書目，可見其努力求取新出版物。

至於譯書方法：傅蘭雅等西洋人先將所欲譯述書

熟讀完全明瞭其內容，再與中國人同譯：西人以西書意義逐句讀成華語，中國人用筆述之。若有難言處，則與中國人斟酌何法可以說明。若中國人仍不明瞭，西人再加解說務使明達。全書譯竣，中國人將初稿改正潤色，使適合於中國文法。若干重要書付刊時中西人再同加核對。至平常書多不必核對，都由中國人訂正。因如上述華徐賈趙舒諸人都學有專長；工作興趣濃厚，尤爲主因——華衛芳序「代數術」(*Algebra by Wm. Wallace*)有云：「傳(蘭雅)君口述之，余筆記之，一日數千言，不厭其艱苦，凡兩月而脫稿，繕寫付梓，經年告成」。又華序「地學淺釋」有云：「其時余寓虹口，所携一童一僕，此外別無伴侶，而此書之稿本、改本、清本以及草圖，皆一手任之，蓋自恃精力之強，不自知其勞苦也。晨起食罷即往瑪(高溫)家，日中而歸，食罷復往，以至於暮」。如此敬業負責精神，成績自然可觀。

一八七一年，翻譯館第一次刊行譯書三種：①、傅蘭雅口譯徐壽筆述「化學鑑原」(*Wells's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of Chemistry by David A. Wells, New York*)。①、傅蘭雅口譯

徐建寅筆述「化學分原」(*An Introduction to Practical Chemistry, Including Analysis by John E. Bowman. 5th rev. London ed.*)。②、傅蘭雅口譯徐建寅筆述「運規約指」(*Practical Geometry by Wm. Burchett*)。譯名一目瞭然，尤以前兩書以「分原」「鑑原」區別更見用心。又如所譯「西藝知新」(*Modern Arts and Manufactures of the West*)，「寶藏興焉」(*A Practical Treatise on Metallurgy*)，「藝器記殊」(*Pocket Book of Useful Formulae for Civil and Mechanical Engineers*)，「延年益壽論」(*How to Live long*)等都顯示在古文及八股盛行環境裏應用淺顯文言書名吸引讀者的苦心。

一八七一年至一八八〇年間，江南製造局刊行傅蘭雅譯書三十四冊，其中製造八冊，算學七冊，軍事六冊，工程測量四冊，航海四冊，化學二冊，物理二冊，醫學一冊。一八八〇至一八九六年間刊行譯書七十八冊，其中物理學十四冊，化學七冊，地理學地質學氣象學共七冊，算學六冊。法律三冊，政治經濟一冊，西洋歷史一冊，政府一冊……顯示這一時期看重

自然科學並曾旁及社會科學人文學。這在當時祇知學習西人船堅炮利環境中是一突出。傅蘭雅為加強所譯書刊佈，江南製造局印行以外，還利用其他出版機構傳佈。總計他一生中譯西書計一五八種（今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有此書全部）。這不僅是空前的並且是迄今還沒有被打破的個人譯述最多紀錄。但這大「量」出品却並沒有影響它的「質」！前國立北京大學化學系主任曾昭掄教授於一九四一年公開指陳：傅蘭雅譯書的品質精湛遠勝其後五十年間（即一八九一——一九四一）國人的譯述（東方雜誌第三十八卷第一號「建國三十年紀念號」曾昭掄撰「中國學術的進展」）。可見傅蘭雅與華蘅芳徐壽等中國同僚對於譯述的謹慎用心，而他們開始工作時即認識把握譯學的主要關鍵，實在是成功的原因。

譯西書第一要事為名目

自歐人挾堅船利炮東來，非常輕侮中國，不願華人學習其科學技術，甚至發表言論指陳中國文學古老生硬，若用以譯述泰西格致與製造等事，將成笑談。

況近年西洋所有格致門類甚多，名目尤繁，而中國並無其學與其名，焉能譯妥？！是一不能超越的困難——但傅蘭雅完全不同意這種說法。他以為不祇末利瑪竇諸人譯述西書成功先例具在，即二三百年前，英國也多假藉希臘羅馬諸國文字以作格致與製造內的新名，後來逐漸減除不用，或改換更妥當的；中國自然也難免要經過這一途程。

傅蘭雅並且進一步認識：西人在中國初譯格致各書時，若留意於名目，互相同意，最初被選用的名辭如能穩妥，後來就不必再大加更改。因此，他提出「譯西書第一要事為名目」一重要原則。並且鄭重指陳：若所用名目必為中華字典內的字義，不可另有解釋，則譯書事永不能成。然中國語言文字與他國略同，都是隨時逐漸生新，並非一旦而忽然俱有，故前時能生新字新義，後日亦可產生新字新義，以至無窮。中西交涉既年多一年，如貿易或交涉事內有新意新物，必設華學新名，始能明顯。這些新名有文雅的也有粗拙的。不論如何，今譯格致西書新名若能應用一致最為理想，切不可混亂。例如傳教第一要名，有稱「造化萬物之主」，有曰「天主」，有作「上帝」，有

曰「眞神」，都未能同心合意，致使名不正言不順事不成。前車之鑑，足資警惕，因此，傳、華、徐等商議多時後略定要事三項：

第一、華文已有之名：設擬一名目爲華文已有，而字典內無處可查，則有二法：①、可查中國已有格致或工藝等書，以及二百年前在中國天主教士及近年基督教士所著格致工藝諸書。②、訪問中國客商或製造或工藝等應知此名目的人士。

第二、設立新名：若華文並無此名，必須另設新名，則有三法：①、以平常字加偏旁而爲新名，仍讀其本音，如鎂、鉍、砒、砷等；或以字典內的字釋以新義而爲新名，如鉑、鉀、鈷、鋅等。②、用幾個字解釋某物時，即以此解釋爲新名，而字數以少爲妙，如養氣、輕氣、火輪船、風雨表等。③、用華字寫西名，以官音（北京官話）爲主，而西字各音亦代以常用相同的華字，凡以前譯書人已用慣的都沿襲應用，使華人可一見而知爲西名；至所已設之新名，不過暫爲試用，若以後能查尋得中國已有古名，或見所設者不妥，仍可更易。

第三、作中西名目字彙：凡譯書時所設新名，無

論爲事物人地等名，都宜隨時抄錄於華美小簿，後刊書時可附書目，以便閱在核察西書或詢問西人。而各書內所有之名，宜彙成總書，製成大部，則以後譯書有所稽察，可免混名之弊。

這三項原則自然不可能包涵譯學上各種問題，但指出了主要的大前提却是具有劃時期的貢獻。傳、華、徐等當時詳慎訂定的西洋科學技術若干中文譯名迄今一百餘年已沿用成習，即初中學生初讀理化課一經教師實驗表證即能瞭解輕氣養氣字義實質。至於跟隨西洋科學技術的進步而繼續不斷出現的中譯新字新辭，可說是傳蘭雅所謀「後日亦可產新字新義以至無窮」觀念的具體實踐。而嚴復自力譯述西洋社會科學書籍時「一名之立，旬月踟躕」，更顯示他懷於「譯西書第一要事爲名目」指標當前的慎重將事。

編製中文科學字彙術語表

傳蘭雅對於「作中西名目字彙」曾經擴大努力。因當時還有許多傳教士在各地從事譯述工作，所用名詞術語紛歧不一。一八六九年，傳蘭雅表示對當時存

在的各種不同科學字彙非常不滿，建議中國境內漢學家應編製一中譯科學字彙表，以適應譯述人的需要。

一八七一年六月，傅蘭雅自製一科學字彙表刊載教會報紙。一教會醫院院長卡爾（John Kerr）編譯化學課本時即加以採用。一八八八年，傅蘭雅因又刊行一「譯述手冊」（內含四種：①、化學材料中西名目表。②、西藥大成藥品中西名目表。③、金石中西名目表。④、汽機中西名目表），將江南製造局譯書所用化學、人體醫學、礦物學中文字彙術語羅列其中。

一八九〇年，傳教士會議在上海舉行。傅蘭雅以凡俗人身份在這一會議中宣讀「科學的術語」論文，強調說明術語紛歧不同的弊害以及求取一致的方法。

他責難西洋人完全忽視中國文學——西人多以為華文不能顯明泰西近年的科學，非用西文，則甚難傳佈中國。這等人看江南製造局譯書工作，不過枉費工力而已。也有人以為西學雖可勉強譯以華文，然不久英語必為萬國公言，可以不必譯書——傅蘭雅斥這等謬論，鄭重說明：「中國書文流傳自古，數千年來未有或替，不特國人視之甚重，即國家亦賴以治國。有自主之大國，棄其書文而盡用他邦語言文字者耶？」傅蘭

雅並且進一步指陳：中國古雅美妙的語文具有許多理由比較其他語文更適合作為世界公言。任何意欲介紹西方科學的人於此必不可忽視或亂用。

傅蘭雅且建議設立譯述字彙標準化委員會，將十六世紀天主教士及十九世紀基督教士譯介西學的字彙加以匯集並採取其中被一般人接受的編製成表作為標準。所有已出版的技術譯述如再版時都須改變其原有術語換用標準術語。這一建議經被接受，一委員會也在不久以後設立，但傅蘭雅不是這一委員會成員，祇在牽涉到有關他的問題時才被邀參加——這委員會兩名美國傳教士指出：江南製造局譯述化學書中的字彙並不完全一致甚至若干名詞也不恰當。傅蘭雅承認難免有歧異却以為所有名詞都很恰當不肯更改；加以委員會份子都是傳教士，殊不願一凡俗人指責他們譯述工作不當。因此這一委員會沒有能繼續存在。

對於西洋科學譯述字彙名辭正式認真加以匯集審訂編製成冊，是一九三三年國立編譯館在南京成立以後的工作之一，上距傅蘭雅最初倡議已六十年（現仍繼續工作）。這些名辭字彙的中譯都是依中國國音作標準。而上錄傅蘭雅所謂「用華字寫書名，以官音（

北京官話)爲主」，遠在中國應用國音字母推行國語統一運動以前，可說是非常正確的先見之明。但在今日海內外中文報刊書籍於人名地名事物仍多沿用方言譯音華字，如美國電影城 Hollywood，臺灣按國音譯作好萊塢，香港譯作荷里活，新加坡譯作何羅衛。再如英國著名科學家 Newton (Sir Issac, 1642-1727) 有譯作牛頓的，也有譯奈端的。又如最近逝世的美國著名金嗓歌王 Bing Crosby，臺灣報刊譯作平克勞斯貝，香港報刊譯作水歌羅士比。其他類似事例甚多，紛歧雜亂，實在困擾讀者。全球中文報紙協會經常集會，是不是能促成標準化呢？(香港刊行繆鑫正等編「英漢中外地名詞匯」應可供參考)。

格致書院與格致彙編編

傅蘭雅在江南製造局工作之餘，更充分運用時間精神努力傳播科學知識，企盼普及於中國一般社會。

一八七四年，上海傳教士與中外紳商組設一「格致書院」。這是兩年前「中國益智會」在北京創立後，中國境內又一傳播西洋科學知識的機構。傅蘭雅、

徐壽是這格致書院主要人物，傅蘭雅兼任秘書，擔負推動工作的實際責任。最初設立一圖書室，陳列中西科學書籍與電報機器、高溫計、伏特電壓計等實物，以及火車鐵道照片等等。企望由此引起中國一般社會人士的興趣，再進一步擴展成爲工藝學校。一八八四年，格致書院開始舉辦論文比賽。這是傅蘭雅針對中國人熱心時務對策及考試的方式以鼓勵華人多讀、多想、多寫有關西方事物。每年按四季舉行，請當地高官命題頒獎。題目自然都關係中國與西學，例如「中國海防議」、「中國當前促進富強主要急務」、「中國建鐵路利弊論」、「中西科學異同之比較」、「絲茶生產貿易不振原因安在？如何補救之」等。最初四年每次參加人數自二十六名至八十一人不等，大約半數是教會中學或大學學生。每季優勝前三名論文都彙印成冊發行，因此很引起一般人興趣，參加人數年有增加。這是格致書院獲得比較成功的一項工作。

一八九四年，傅蘭雅開始在格致書院作有系統的講課，分別是採礦、電器、測量、建築工程、汽機、製造六項，他應用純熟華語配合幻燈片說明。後來又增設算學課程。參加聽講的人更加踴躍。一八九六年

二月，傅蘭雅公開表示：這可說是實現了格致書院最初創立的原計：使它成爲中國境內傳授西洋科技的中心之一。

傅蘭雅基於編刊「教會新報」的經驗，體認報紙雜誌可以普遍到達中國全境各地，比較格致書院功用更加廣大。一八七五年十一月因又宣告：一由他主編專門傳佈西洋科學的月刊即將問世。不久，北京「中國益智會」寄信傅蘭雅：該會決定解散，原已編印的「中西聞見錄」雜誌同時停刊，願讓傅蘭雅將它合併於新創雜誌，所有訂戶及撰稿人名單也一併轉讓。傅蘭雅獲得這一意外的鼓勵與便利，聲勢更壯大。一八七六年二月，這一月刊用「格致彙編」名稱正式發行，是中國近代科學雜誌元祖。主旨在報導西洋一般性科學消息。介紹已刊各種中譯科學書籍、傳授科學課程或有關演講等，文字以外並刊載有關圖片。北京同文館中外籍教授及傳教士等撰述長篇或短篇論文，並自由選刊英美雜誌文字圖片。內容充實，另有「編者通信」一欄，答復遠近讀者各種函詢。讀者興趣因更增加，這一雜誌的功用也顯現出來。傅蘭雅爲此忙碌而

愉快，不得不聘一助手協助處理與日俱增的函件。

格致彙編創刊的最初兩年按時出版。後因傅蘭雅回英國渡假，每期刊行時日稍有延緩。一八七九年至一八八一年又恢復正常。一八九〇年至一八九一年間祇刊行三期，自後未再繼續出版——這一雜誌每月最高發行數字約四千餘份，流傳國內各地。當時英美人在華刊行的報紙對這一月刊都加以贊揚，但指出如果內容能通俗淺顯，一般讀者興趣必更增加，影響也就更廣大。

主編學校教科書創設科學書庫

傅蘭雅精力過人，對於傳佈西洋科技更具有非常熱誠。因此除上述各項工作以外，又有兩項工作自動或被動的加在他的肩上。

一八七七年，基督教在華各派全會在上海舉行，傅蘭雅與幾名凡俗人也被邀參加。全會決定設立益智書會(The Sch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從事編輯一套學校教科書，使中國人同時得學習中英語文及各種知識。傅蘭雅被選任秘

書。幾次會議後決定編輯初級與高級學校教科書各一套，其中包含算學、測量、天文、地質、化學、動物、地理、歷史、語言、音樂。「教科書」一名從此開始出現於中國。

一八七九年十月，傅蘭雅卸去益智書會秘書職務，改任是會總編輯，主持全部教科書編輯工作。一八八六年，一百零四種、教科書出版，其中四分之一是傅蘭雅執筆，內計天文、地理、化學、氣象、歷史、科學字彙等十二種，植物、機械、礦物等掛圖及手冊五種，天文、地理、地質、化學、聲學等綱要八種。另編「西洋的工業」掛圖八種綱要十種。其餘七十餘種也多經傅蘭雅過目審閱。這是中國近代教科書元祖。

一八九〇年，基督教在華各派全會改組成爲中國教育會 (The Education Association of China)。一八九三年七月，教育會聘傅蘭雅爲中國紀錄報 (Chinese Recorder) 教育欄編輯。這一每月刊載一次的特欄，主旨爲使在華教育工作者人員得有切磋討論本身種種問題的機會。傅蘭雅曾提出化學

術語一主題加以論列。可見他真是念念不忘科學字彙術語的標準化。

傅蘭雅努力譯述及編輯工作時也體認出版品銷售流通的重要。當時中國各地祇有古書店，即教會在上海設立的印書館也祇售賣本版書，還沒有一綜合性書店爲一般讀者服務。一八八五年，傅蘭雅因特創立中國科學書庫，發售江南製造局譯刊書、外國學人及傳教士譯著以外，同時也販賣中國經史文學書籍。一八八六年書庫售書目錄列舉中外書籍、地圖、掛圖等三百七十一種。兩年後的目錄增至西學書六百五十種、中國書二百二十八種。不久，北京、烟台、奉天、天津、杭州、汕頭、福州、廈門、香港等地先後開設書庫分店。先後稍售書籍十五萬冊。

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戰爭後，中國人對書籍出版更感需要。一八九七年，商務印書館創立。科學書庫營業更盛。傅蘭雅寄信北京同文館總教習丁韋良 (William A. P. Martin) 指陳：這些事實都有助於中國教育進步，正是我們時刻不敢稍懈的追求目標。

啓發中國人的維新思想

傅蘭雅這樣廣泛的努力，大約經過十餘年才在中國社會引起反應或影響。這在當時守舊錮蔽的環境加以交通通訊極不便利的情況是不足怪的。

一八八二年，康有爲赴北京應鄉試歸途經上海，目睹黃浦灘上繁華，益知西人治術確有根本，乃大購西書回廣東講求，聲光化電重學及各國史志都加涉獵，從此「始盡釋故見」。一八八五年，康病甚，讀西醫書，「以信西學之故，創試西藥，如方爲之，乃漸效」。這是康自傅蘭雅譯書所受切身利益。是年刊行傅蘭雅口譯，應祖錫筆述的「佐治芻言」(*"Homely Words to Aid Governance" in Chambers's Educational course, ed. by Wm. and Robt. Chambers*)並且是當時所有歐洲書中文譯本對康有爲影響最大的。是書說明人生的目的是同登康樂。人人應工作，不應懶惰。並且強調人人平等、譴責各國間的戰爭，指示聯合衆邦爲一國的好處。一八八七康撰「大同書」時於這些論點都加以利用。但康並不完

全贊同是書其他若干論點：「英人傅氏之論生計，欲以十里養千人爲井田，其意仁甚。然亦不可行也。蓋許人民買賣私產，即各有私產，則貧富不齊，終無由均……蓋非太平之道。」因此康頗不滿足，認爲傅蘭雅譯述西洋政治書籍太少。

一八九〇年春，梁啓超十八歲，往北京會試時經過上海，始見江南製造局譯述西書，「心好之，以無力不能購也」。兩年後才盡購江南局譯書及傅蘭雅主編「格致彙編」用心閱讀並「息慮而熟思」：「今日時事，非俟鐵路大興之後，則凡百無可言者」。一八九七年更編製「西學書目表」，序例指陳「國家欲自強，以多譯西學書爲本；學者欲自立，以多讀西書爲功」。全表列舉西書三二九種，其中傅蘭雅譯書計一九種，占總數三分之一。梁對「佐治芻言」也曾特加讚揚。

康梁是戊戌（一八九八）維新運動主角，傅蘭雅譯者對他們維新思想具有啓發作用，事實顯明。祇可惜他們沒有機緣與傅蘭雅相聚討論。

譚嗣同是戊戌維新六君子中惟一曾與傅蘭雅晤談的。譚是格致彙編創刊後的熱心讀者。一八九四年北

上途中道經上海特往拜訪傅蘭雅。在傳處看到萬年前化石、計算器、X光相片等，深感「天地以日新，生物無一瞬不新」；「奈何自以爲有得，而不思猛進乎？由是訪學之念益急」。而傅蘭雅更告訴譚：「格致而有止境，即格致可廢也。今雖萃五大洲人研格致，不過百千萬繭絲，僅引其端焉。久之又久，新而益新，更百年不知若何神妙？況累千年萬年十萬百萬千萬萬年，殆於不可思議。大約人身必能變化，星月必可通往，惜乎生早，不得見焉」，傅蘭雅富想像創新觀念對科學進步有深刻認識由此可見。事實上：在這「預言」後七十餘年，科學進步，即已達到「人身必能變化，星月必可通往」境界。祇可惜中國迄今沒有能迎頭趕上。

科學觀念與科學研究在中國不能普遍發展，傳統包袱尤其所謂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重輕辯論，是重重障礙中一主要因素。這在譚嗣同與傅蘭雅初次晤聚時即見其端。譚上歐陽夫子函稟有云：「傅蘭雅精於格致者也，近於格致亦稍有微詞，以其不能直見心之本原也。嗣同既悟心源，便欲以心度一切苦惱衆生，以心挽劫者，不惟發願救本國，並被極彼盛之西國，與

夫舍生之類，一切皆度之」。

譚嗣同原計多與傅蘭雅討論這一問題，嗣因傅離滬赴美而未果。幸在中國科學書庫購得一八九六年新刊傳譯述「治心免病法」(*Ideal Suggestion through Mental Photography by Henry Wood, 2nd ed. Boston, 1894*)一卷。譚「讀之不覺奇喜」：「以爲今之亂爲開關未有，則亂後之治亦必爲開關未有，可於此書卜之也。……此書已入佛家之小乘法，於吾儒誠之一字，亦甚能見到。由此長進不已，至萬萬年，大約一切衆生，無不成佛者」。這種推論顯然不是傅蘭雅選譯是書的初意。

一八九六年，傅蘭雅應聘到美國西岸柏克萊(Berkeley)加州大學擔任東方語言文學講座教授。先後開設中國日本語言、歷史、文學、政府、法律、哲學、宗教、社會情況、對外貿易等課程及專題討論。在職十七年，一九一三年退休。美國西岸研究中國文化語文的堅實基礎從此奠定。

傅蘭雅在加大任課餘暇，仍繼續爲江南製造局譯書十四種。因他深信「中國多年舊習，必賴譯書等法始漸生新」，故於此孜孜不倦。他對於中國生徒出洋

求學回國後，「惟以所學者爲資本，賴以致富」，極少人努力譯書工作，非常失望不滿。

傅蘭雅熱愛中國，企盼中國推陳出新富強勝昔。同時，他也注意協助中國殘障人民。一九一一年，他捐款在上海設立聾啞學校，在漢口設立盲人學校。一九二八年逝世時遺囑：捐款在上海設立盲女學校，捐款創建中國盲人講習所，他的兒子 George B. Fryer 負責主持一切，直至一九五〇年。

日本書中譯本粗製濫造的流弊

一八七一年，江南製造局譯書開始問世時，適日本特派柳原前光來華，特購取多種回國做行。從此猛力加鞭，很快地就超越中國。中國人且以譯述日本書爲吸收新知的捷徑。

一八九七年，董康、趙元益等合資創設「譯書公會」。趙曾在江南製造局擔任譯述工作，董是日本留學生。因此，「譯書公會章程」說明：「茲已向倫敦巴黎各大書肆多購近時切要之書，精延翻譯高手」。「至日本爲同文之國，所譯西籍最多，以和文化中文

取徑較易，本會尤爲此兢兢焉」。從此，加一九〇四年編成的「譯書經眼錄」序例所指陳：「於是日本文之譯本，遂充斥於市肆，推行於學校，最使一時之學術，變成風尚；而我國文體亦遂因之稍稍變矣。」

按「譯書經眼錄」統計一八九七年至一九〇四年八年間，中譯各國書共計五三三種，其中譯自日文的占總數五分之三即三三一種，譯自英美書籍計八七種。法文書一五種，德文書二五種，俄文書四種，其他八一種。

清末民初，政局動盪，教育學術界尤不安定，譯書工作自少進步。一九二五年三月，章士釗任北京政府教育總長，認識「自上海製造局倡譯書以還，垂四五十年，譯事迄無進步；而文字轉形燕俚，所學未遑探索，彎刀妄割，謬種流傳」。因此宣佈：教育部設編譯館，要求各大學教授通力合作，優加獎勵，務使期年之間有新著數十百種，布之叢舍，辭理並當，鑒人取求」。祇以政局變化，計劃未得實行。

國民政府建都南京後五年，國立編譯館才正式組設成功。審定各書局編輯教科書、審訂編製若干自然

科學或應用科學名詞、編譯若干西書，是編譯館三項主要工作。對於西洋社會科學與人文學名著的譯述既少，有關名辭字彙的審定編製印行的工作却沒有着手進行。而上海書商自西文粗製濫造的譯書充斥市面。因此，一九四〇年一月，戴傳賢特手撰提案文，鄭重請國民政府迅速組織審定人文科學名詞委員會：

「中國自派遣日本留學生以來，文字文法文章，受日本影響最大。在（第一次）歐戰以前，日本文體裁用語，大體可謂為漢學派，故影響於中國者，利多而害少。歐戰開始（一九一四年）以至於今日，入於第二翻譯期，因彼等漢文根底太差，識字不真，文法文章修辭之素養，又復異常淺薄。且作家多迫於生計，譯著目的，僅在易取金錢，出版公司又復只在營利。於是粗製濫造之譯者，幾占百分之九九，用字則別字連篇，行文則沙泥並下。以量言之，誠超過日俄戰前（一九〇四）數千百倍。而以質言之，則真毫無可取。始則其弊僅在翻譯，繼則著作亦受此惡劣影響。其後官公文書翰札，亦復語不成語，文不成文。且各人著作，自為體例，亂雜無章，達於極點。

。在此時期，中國留日學生所受影響之惡劣，更有甚於日本自身者。以文字祖國，乃至於是，其可憂慮，不知紀極。今對日抗戰，已二年有半，對倭軍事之侵略，不知犧牲若干萬生命。而文字上之肅清抵抗工作，乃尚未曾有人注意。試讀報紙雜誌教本文書，便可知此事關係之大，並不亞於軍事。矯正之法多端，而正名實為根本。擬請飭下國立中央研究院與編譯館，迅速組織審定人文科學名詞委員會。斟酌古今，綜覈名實，制定法律經濟政治文學美術用語，限期一年至一年六個月完成。以後一切譯著教科書，必須一律使用公定名言，公文書類，尤宜嚴格。庶幾正本清源，數十年來被日本一知半解之徒所破壞之中國文字，得以漸納諸正軌」。

戴傳賢是國內通曉日本事情最深刻的少數人士，所著「日本論」迄今還受日本人注意，在當時國民政府居元老地位，發言建議尤具權威性。加以這一提案文結論還強調：「此事為建國大端，古來以議禮制度考文三者為統一要政，我總理（孫先生）於此，尤視為救國建國之精神所在。自然應受重視，見諸實行。

然而細按「戴季陶先生編年傳記」，却没有此事進一步發展的相關記錄；其他文獻也未提及有這樣一委員會的設立及其成就如何？事實上：三十餘年來，編譯館及其他學術機構並沒有刊行一冊社會科學與人文學名詞。香港近刊江紹倫編「英漢社會科學、教育學詞彙」一冊，也祇聊備一格而已。戴傳賢指陳的種種惡劣影響，決沒有渲染誇大。國內出版界及譯者自日文書粗製濫造的譯本，文字蕪雜，名詞字彙紛歧混亂，其所表達的觀念理論自然極不正確，讀者所接受的知識價值如何，不言可喻。戴傳賢所謂「正名實為根本」，實即重申七十年前傅蘭雅提示「譯西書第一要事為名目」。不幸，國人竟捨西趨東作投機取巧捷徑。學術教育不能進步國事也更紛亂不堪。今特舉述傅蘭雅種種努力，如有心人能感愧奮起，亡羊補牢，猶未為晚！

書評書目

新書預約

十二月中旬出書，預約八折
(十二月十五日截止)

搖滾樂

定價：40元

邱義仁・田正仁 合譯

鄉村音樂

定價：55元

楊嘉 譯

美國的民歌

定價：50元

陳以正 著